

清華教師六四回憶錄

海明

1999年5月18日

提要：

- [一 胡耀邦逝世](#)
- [二 追悼會](#)
- [三 四二六社論與四二七遊行](#)
- [四 四二九“對話”](#)
- [五 學生絕食](#)
- [六 聲援絕食](#)
- [七 戒嚴](#)
- [八 五月底](#)
- [九 六四](#)
- [十 撤離廣場](#)
- [十一 清華死了四個學生](#)
- [十二 燒軍車在鎮壓之後](#)
- [十三 秋後算帳](#)
- [十四 六四引發蘇東波](#)

六四回憶錄

□海明□

一 胡耀邦逝世



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逝世。他的死是89學運的導火索。這本身就是很值得琢磨的。

胡耀邦是在1986年的學生運動之後被從總書記的位置上拉下來的。他被老同志們認為過於自由化，對學生運動鬥爭不力。加上其他我們並不知道的黨內鬥爭，他成了犧牲品。胡耀邦從1975年就追隨鄧小平整頓文革給中國各個方面造成的混亂。萬里在鐵道部，周榮鑫在教育部，胡耀邦在科學院大搞整頓改革做實事。1977年後胡耀邦在中央組織部力主為文革中受衝擊的老幹部平反。後來搬倒了華國鋒，鄧小平又不願意居前臺，就讓胡耀邦當了總書記。胡耀邦說話直率，手舞足蹈。

不敢說形象優雅卻也熱情奔放。他堪稱是老鄧改革的急先鋒。

其實在1985年學生運動中，胡耀邦是學生們的矛頭指向。那一年學生提出了反日口號，認為當時黨和國家領導人對於日本的錢過於依賴，對於日本人過於親密。在學生們的批判中，胡耀邦首當其衝。因為他在那一年親自邀請了三千日本青年來訪中國。85年的學運以北大為主，我不很清楚當時更明確的政治主張是什麼？導火索又是什麼？

學生們習慣於上街遊行是始於女排第一次拿下世界冠軍。這裏還有一段小插曲揭示“振興中華”口號提出的戲劇性。當電視上轉播女排打完了最後一場球，勝利地登上冠軍的高臺，中國人尤其是年輕人著實是被大大地振奮了。中國自從對外開放以來，一方面接觸了國外先進的科學技術和令人眼花繚亂的生活方式，另一方面則是對於文革的批判，都使國人產生了中國不盡人意，中國落後別人一大截的感覺。中國的民族自尊心急需要被振奮一下。女排初登冠軍寶座恰恰創造了這麼一個機會。

另外，體育運動的勝利，尤其是集體球類項目，總是要歷盡艱辛地去取得。所以是特別能煥發出青年人的激情，中國如此，外國亦如此。

女排勝利之後，北大學生率先遊行。他們向清華方向進軍，他們希望清華學生與他們一起歡慶女排的勝利。其實，清華的學生也在遊行，也在燒掃帚疙瘩，只是沒有出校園而已。在向清華行進的過程中，一部份北大學生高喊“進軍清華”的口號。一位有頭腦之士感到這口號有威脅兩校學生關係的可能，遂將“進軍清華”演化為“振興中華”的口號。然後這一口號就上了報紙，就傳遍了全國。其實，“振興中華”的口號也有相當的政治問題：振興的對象，一定是弱小的，常敗的，萎靡不振的，不興旺的。在政權更替之後喊出這種口號是表明新政權從舊政權手裏接過的是一個爛攤子。改革開放不是政權更替。但是當時的領導人之所以認可並鼓勵這個口號就是要與毛澤東時代劃清界限。依我來看，改革總設計師的頭銜不比四個偉大遜色。

總之，從上街慶祝女排勝利之後，遊行成為高校和北京青年表達情緒的一種慣例。以北大清華為例，輕則在校內轉一圈，再則就到海淀街上，最高級別的當然是到天安門廣場了。此線路從五四開創至今。

1986年的學運始於合肥的中國科技大學。那年科大進行人民代表的選舉，當時作為副校長的方勵之和管惟言都表示支持真正的民主選舉，校方不操縱選舉，讓學生表達出自己的願望來。結果選舉成了一場學生運動。學潮很快蔓延到上海，北京。上海搞的規模最大。學生佔據人民廣場，在上海市委大樓前請願，交大的學生還和當時的上海市市長江澤民對話。北京的學生這次動得最晚。但北京畢竟是政治的中心，北京學生一動，中央就坐不住了。這次學運以胡耀邦失去總書記的職位而告結束。趙紫陽接任總書記，方勵之、王若望、劉賓雁被開除出黨。但是一場大規模的反自由化運動，被趙紫陽不允許衝擊經濟領域的禁令而很快化解了。

1988年，趙紫陽力主加快經濟改革，提出放開商品價格。北戴河會議上即將通過決議。誰知放開價格的消息不徑而走，社會上搶購成風。一時間，銀行擠兌，商品告缺。趙的大步改革計劃流產，不得不實行陳雲提出的“調整，整頓，改革，提高”的政策。這一回合是趙開始走下坡路的重要轉折。具有諷刺意義的是，趙當時的許多經濟政策在他下了臺以後的90年代裏都一一實現了。

86年學運導致胡耀邦下臺，使他具有了一種象徵：他就是學運的同情者，支持者，他是為學運而下的臺。現在（1989年4月）胡耀邦死了，而且死得不在其位，人們就非常同情他，為失去一位還算開明能夠聽進別人的一些話的領導人而傷心。很多人自發地悼念他。有的人到他家，有的人到天安門廣場。挽聯悼文跟著花圈一起出現。很快，各校又出現大字報。和1976年“四五”一樣，甚至比“四五”更明確，悼念只是契機，廣泛的民主運動隨之而起。天安門廣場從17日起，天天聚集著很多人。警察在驅趕人群時使用了暴力。19日晚，學生在新華門前靜坐示威，後被強行送上大轎車離開。一女學生在被推搡上車時覺得自己在黨的最高領導機關門前被給以非人待遇而非常氣憤地喊出了“打倒共產黨”。

二 追悼會

追悼會訂在4月22日。據說中央對如何評價胡，一位已不在位而曾任黨的最高職位總書記的人，也是費盡了腦汁。追悼會前宣佈：追悼會當日天安門廣場清場戒嚴，不得有人滯留。學生聽聞後於21日連夜進入廣場。我還記得那天晚上在學生們準備集合出發前，清華校園裏響起的歌聲“妹妹，你大膽往前走啊。往前走，不回頭。……”

北京高校幾萬學生在廣場過了一夜。第二天的清場戒嚴自然難以執行。追悼會期間，三名學生代表持請願書在人民大會堂臺階上跪請面見中央領導人。當時傳出李鵬要出來接見，結果只有因轉播女排和足球比賽而聞名的宋世雄出來了一下。原來答應的胡耀邦靈車繞廣場一周也未實施。靈車從大會堂側門離開直接去了八寶山。學生連影子也沒見著。

追悼會這一回合，學生勝了前半部：廣場戒嚴成了泡影；卻輸了後半部：學生的什麼要求也沒得到。但是誰贏了呢？我也說不準。作為黨和政府領導整體不能面對學生並失信於人，不及時也不積極。我想是根本沒有這種意願，要和學生，從而和更多的人民，接近和溝通。此舉激化了矛盾，惹怒了學生。北京高校的學生開始罷課。請注意，學生自發地罷課，在解放以來還是第一次。文革期間的罷課鬧革命多少是有中央領導的讚賞和默許的。

追悼會這天，我還照常給學生上課。但來的學生不多，大家的興奮點都在這場運動上。學生們在課上問我自己對學生運動的看法。我回答說：“自發的學生運動永遠是好的，動機是善良的。學生運動結果不好只是在於如何引導如何處理上的不好。沒有廣大學生都是壞份子的可能性。但是學生運動在中國還沒有勝利和成功的先例，

希望也很渺茫。我們能否想出不同於當年共產黨奪權來改變政治發展方向的方式來取得我們的勝利呢？”這一點很難的。我們一向就受的這種教育，也只接觸過這一種模式：大規模的群眾運動，萬眾一心就能獲得勝利。

追悼會後，由 21 所北京高校的代表發起成立了“北京市高等院校學生自治聯合會”，即後來有名的“高自聯”。組織雖然有了，但並沒有形成完善的聯繫與管理網絡。各校相應的組織也沒有搞糾察隊來阻止老師和學生去教室。作為教師，罷課的第一天我還去了教室，但沒有學生來上課。

各校的學生會和研究生會開會討論對待學潮的態度與策略問題。北大研究生會罷免了現任主席，因為他站在官方一面而不代表學生說話。清華也有罷免的呼聲，但清華的主席表示支持罷課。學自聯在與各方聯繫對話。清華學生的代表曾被單獨邀請與教委和團中央的人對話。後因違背各校聯合行動的原則，而被清華學生取消了。

罷課持續到第三天（4月25日），大字報在各個校園內鋪天蓋地。北大、清華、人大等校的學生組織還有了自己的廣播站。雖然不上課了，學生們都沒有離開學校。學生和各種各樣的人聚在各校的中心地帶看大字報、傳各種消息，討論和抨擊時事。這樣的中心地在北大是三角地，在清華是食堂旁的十字路口。這裏是東區和西區的中心交匯處，又有以住研究生為主的14號樓和15號樓，並有一條直達主校門的路。外面的人來很容易就找到這裏並感受到熙攘熱烈的情緒。廣播站的高音喇叭就裝在15號樓的頂上。不少外國記者到各校園裏採訪。我碰到過一個美國記者，他說他採訪過南朝鮮和菲律賓的學生運動，但中國學生運動的規模之大讓他印象最深。他問你們這麼大規模的運動要爭取的是什麼？爭取民主。有什麼具體目標？學生答不上來。其實，最簡單不過了：中國學生運動之所以與南朝鮮和菲律賓的學生運動不同，就在於沒有要推翻政府的目的。而學生們所理解的民主，最基本的就是有發表不同意見的權利。

我最不能容忍外國人和一些中國“學者們”對學生的這種批評：學生們搞民主卻對民主的理論一竅不通。

三 四二六社論與四二七遊行

這期間，全國各地都對北京的形勢予以關注。各地的大專院校早就動了起來。到此時為止，沒有任何中央一級的領導直接與學生們談過話。對學生請願提出的七點要求，對學生們提出的政治意見，對學生們儘可能採取和平及可取的方式表達的意見，都沒有人予以理睬。後來，4月22、23日長沙和西安出現了搶商店燒汽車的事件。根由在學生嗎？北京除了高校罷課外，社會秩序和人民的生命財產安全都沒有受到任何威脅。

4月26日《人民日報》在鄧小平的授意下發表了《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的社論。社論中隻字不提這場運動逐步發展起來的過程，沒有一點對學生政治意見的論述和評說，把學生運動的主流與一些社會不安定因素相提並論，

將廣大群眾積極響應遍及全國的這場運動定義為是一場動亂。把責任一味推給學生，聲稱要堅決地不惜任何手段地迅速制止動亂。

領導中的實權派是鐵了心的：只走對抗一條路，絕無與學生和群眾尋求共同點的任何願望。鄧小平召集人講話，提出三點：1，不怕罵娘；2，不怕國際輿論；3，不怕流血。

鄧的講話迅速由各級領導往下傳達。清華由何東昌親自傳達。26日晚已經傳達到所有教師。清華要求教師到學生中去勸阻學生再次上街遊行。並威脅說上街遊行的一切後果必須由自己負責。

在如此高壓政策之下，高自聯、各校學生自治會都面臨著嚴重的考驗。學生們聽到社論後的反應是很強烈的。對被扣上一頂破壞安定團結的大帽子感到非常委屈和憤怒。北京的學生是從政治的角度出發來搞學運的，是懷著一種崇高的愛國熱情的，是很少帶有個人色彩的，現在被扣上動亂分子的罪名，當然不高興。學生們要豁出去，要反對社論的說法，要再上街表達這種反對的意見。對學生領袖來說，如果政府真的實行高壓，學生與政府發生正面的衝突，真的發生流血，他們實在感到負不起這種責任。有的想勸阻學生，有的乾脆辭職不幹了。高自聯是如何做出決定的？又如何把這一決定傳達給各校學生的？我不知道。我在這只講我親眼看到的。4月26日晚10時之後，仍然有許多學生在清華十食堂前討論，也有許多教師在以反右文革的親身經歷告誡學生只有熱情沒有策略是不行的。希望學生不要太單純幼稚，把問題想得太簡單。

其實學生們更多地是討論第二天要穿球鞋帶濕毛巾。再後，十幾個學生跑步在學生宿舍區反覆高喊“明天八點，上街遊行”，“明天八點，上街遊行”。在這批學生也散了之後，我才看到兩個北大學生騎車來到清華，了解清華學生的決定。當知道清華學生第二天遊行後，才放心離去。

第二天清早，我先騎車到中關村、清華、北大校門幾處看看。中關村路口有警察的麵包車，北大、清華的校門也加強了警衛。看來，海淀區（實際上整個北京市）都已經處於高度戒備狀態。

我轉一圈回到學校後，清華學生已經開始出發了。同學們打著各系的旗子和一些橫幅標語，諸如“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中國共產黨萬歲”，“反貪污，反腐敗”等等。在這之前，我還沒有真正地參加進學生的活動。但是這次學生是面對高壓，是有真的危險。而且賈毅和蔡敖等青年教師已經在學生隊伍中了，我就加入遊行的行列。

清華的遊行隊伍沒有出通常走的南門，而是出西門先往北大方向走。在校門內外我看到幾個清華團委的幹部。前一天晚上，他們應該是到學生那去勸阻的，現在他們沒有再來勸阻同學不要上街遊行，他們只是分散地離遊行隊伍有相當距離地站在那些不易被人看到的地方靜靜地觀察。我猜他們的使命是要記下有哪些不該去的人也在遊行隊伍中。因為後來我參加遊行，剛走出校門，就有電話打到系裏問我的情況。清華這個系統的工作效率從來都是不低的。要不賈春旺怎

麼能從清華的團委書記躍到國家安全部呢。

當清華隊伍走到北大東門時，北大的東門完全緊閉。一位北大學生從牆上探出頭來告訴我們：北大遊行隊伍已經出了南門。清華的隊伍隨即揮師南進，準備與北大的隊伍在行進的路上匯合。在中關村路口，遊行隊伍遇到了第一次阻攔。具體交涉的情況我不清楚，只知道在拖延了一段時間後，我們得以繼續前進也沒有發生流血 的衝突。

遊行隊伍走到人大校門時，才知道人大的學生集合了很長時間，久不見清華北大的隊伍來，已經解散了。現在他們又重新集合隊伍。

街上的行人先是對遊行的學生很冷漠，有一種視而不見的態度。很快就有人駐足觀望，然後就有人表示同情。一母親帶著孩子要把他的餅乾送給學生吃。一中年知識分子大聲向同學說：“在美國的中國留學生對這次民主運動表示支持。”在大華襯衫廠，先是有人開窗向外觀望，後來想是有領導責令，窗戶關上了，人也從窗後 消失了。

在人大和友誼賓館的路口，隊伍又遇到了阻截。這次不僅學生自己，周圍的群眾也幫忙向阻截的武警戰士做工作讓他們放行。所以這一關卡很快就突破了。匯聚了北大、清華和人大的遊行隊伍又轉往北師大。這四所大約 就是北京最大也最具政治影響力的大學了。鋼院、北航、政法大學、中科院研究生院都已在遊行隊伍中。幾天前各校罷課期間，《人民日報》有篇報導說即使在各校 都罷課的情況下，北京中醫學院的學生仍然堅持上課。今天北中醫的同學就打著校旗和“我們來了”的橫幅也出來遊行了。據報導，北京四十幾所院校的十幾萬學生參加了4月27日的遊行。

在遊行隊伍通往市中心的每一個主要路口都有武警戰士。由於前面的阻截都失敗了，也許他們接到了不能與學生發生暴力衝突的指示，在遊行隊伍上了二環路後再 沒有受到他們的阻截。武警們都撤到路旁眼看著學生走過。有的學生在路過他們時唱起了《便衣警察》的插曲：“幾度風雨，幾度春秋，風霜雪雨搏激流。……”學生們當然是想喚起他們能有《便衣警察》中英雄人物的思想境界：不為當勢的權力階層服務，而以人民群眾為最高原則。警察們的表情是麻木的。他們也不和學生一起唱，他們既沒有憤怒敵視，也沒有同情和支持。他們似乎是一群沒有個人意志，沒有個人感情表露的人，只是機械地執行不管好壞的只要是上級的指示。他們的人數和他們的冷漠很快就被北京大街上越來越多的人和越來越熱烈的氣氛淹沒了。

我們越往市中心走，情緒越高漲。這種高漲是遊行隊伍與周圍群眾的共鳴。沿途工廠，機關，住戶的窗戶都打開了，好象再也沒有那的領導能阻止開窗觀望了。一些中小學生，甚至一些幼兒園的小朋友都站在路邊好奇地看著這支浩浩盪盪無比壯觀的遊行隊伍。

走到二環路上，路邊都是人，立交橋上更是人擠人。有的人向遊行學生揮手，有的人眼眶濕了，有的人和遊行隊伍一起唱國際歌。遊行學生口號喊得更響

了，歌也唱得更頻了。旗子和橫幅標語也舉得更高了。橫幅中有“媽媽我們沒有錯”，“我以我血荐軒轅”，“中央電臺，顛倒黑白”，“人民日報，胡說八道”。在復興門立交橋，橋上橋下擠滿了人。圍觀的群眾人數已經超過了學生人數。

在民族宮前，有一姑娘手提竹籃，走到我們跟前才打開蓋在竹籃上的布。竹籃裏是兩瓶可樂大塑料瓶的水。在我們走了這麼遠的路後，水是多麼及時寶貴。而且這姑娘是冒著一定的政治風險。這一幕又多像戰爭年代支前的景色。

要知道，就在前一天晚上北京市召開萬人大會。陳希同和李錫銘動員北京反動亂，各個單位也都開了相應的傳達會。但是今天學生還是出來遊行了，並且得到了北京各界群眾的廣泛同情和支持。在旁觀的人中有人這樣講：“只有學生才敢在政治高壓之下上街遊行。我們很同情學生，也對現在的許多腐敗的現象不滿，但我們不敢遊行。我們的很多東西都在領導的手心裏攥著呢。”其實，他們只要站在路邊看就給了學生支持。

4月27日的學生大遊行比起陳希同的萬人大會的動員效果要大得多，好得多。它向世人宣佈，學生堅決反對以《人民日報》社論為代表的對學生運動所下的結論。在得到群眾廣泛支持下，它又表明，群眾與政治官僚有著極其深刻的矛盾。

當學生遊行隊伍從東西（東邊有北工大，二外，化工學院，政治經濟學院，美術學院，廣播學院，等等）兩個方向到達天安門廣場時，廣場已經被部隊佔領了。廣場上停滿了滿載戰士的軍車。好象學生與部隊達成口頭協議，軍隊不來阻止學生遊行，學生則不進廣場，不搞大型集會，只從廣場前穿過。

遊行隊伍穿過廣場，走過王府井，一直向東到建國門才往北拐，沿著東二環路往回走。路過的立交橋上不斷有人向遊行隊伍撒麵包，路邊送水送啤酒的絡繹不絕。走到朝陽門時，天已經開始黑了，但沿途依然有很多人，直到很晚都不散去，要看有史以來規模最大，最有氣勢，頂著壓力的大遊行。

我走到德勝門就累得快走不動了。雖然我還有過拉練的經歷，已許多年沒有這麼走過，還真是不行了。有個學生要攙著我走，搞得我很是慚愧：老師好象應該幫助學生的，不想卻需要學生的幫助。我就咬了咬牙挺了下來。隊伍走到西直門時，陸續有各校的汽車來接本校的學生回去。清華的車卻沒來。直到我們快走到五道口，離學校不到一公里的時候，清華的車才來接。學生們很有情緒，堅持說不坐。弄得司機很尷尬。我和蔡敖知道並不是司機的問題，就對司機表示感謝，還建議實在走不動的同學可以上車。

我們從清華的南門回到學校。進南門後有幾百米都是教師宿舍樓。與外面熱烈的氣氛極為不同的是教師宿舍區的寂靜。我的感覺是清華的教師們注意與學生保持一定的距離，不能與學生認同。也許時間太晚也是一個原因，我們回到學校時已經過了半夜12點。只有到了學生區才有熱鬧的歡迎氣氛，學生食堂專門準備了夜宵給遊行回來的學生。這次遊行歷時17個小時，步行百餘裏路，

雖然沿途有送吃送水的，但從沒停下來吃一頓整飯。所以這頓夜宵還是很及時的。

四 四二九“對話”

4．27的遊行是一次勝利的大遊行，喚起了民眾，展現了力量。它的勝利成果之一就是對話。

這次遊行勝利的結果就是中央很快就安排在4月29日與學生代表對話。政府方面的人是：國務院發言人袁木，教委副主任何東昌，北京市副市長陸宇澄，北京市委副祕書長袁立本，以及團中央和全國學聯的負責人。學生則由各校代表組成，好象學運的領袖人物差不多都在其中。

這次對話不管有多少不能讓人滿意的地方，都是一次巨大的進步。我當時看完電視轉播的對話後就寫了一篇東西，後來形勢發展太快，沒來得及發表。現在摘錄如下，從中可看出我當時的心境：

國務院領導同志與大學生的對話進行了，並通過電視向全國播發了。

這邁出了中國政治民主進程中的一大步，真正把多少次會議與輿論宣傳所呼籲的政治透明度提高了許多。這是這次學生運動的勝利！也是國家的勝利！也是政府的勝利！殊不知這次對話需要我們共和國的領導人在當前的客觀外部環境與自我心理條件下克服了多大的困難。但這確確實實是一次勝利，是一次巨大的進步。也許我們有些同志，包括領導同志還不能這麼認為，至少現在還不這麼看。但從長遠、從歷史來看，這一點應該是無疑的。

社會的發展進程和自然界大尺度的運動是一樣的：都是不可逆的。就象當年真理標準的討論一樣：一個閾值突破後，儘管有這樣或那樣的一些回復，但都不可能回復到原來的狀態。所以這次的勝利，儘管也還會有說難聽的是“反攻倒算”說好聽的是“吸取教訓”，但這前進的一步也已跨過了一個閾值，是怎麼退也退不回來的！這是國家幸事！民族幸事！

不能不說的是，這個進步就是靠同學們的滿腔愛國熱忱和民族正義感所取得的。試問：如果沒有4．27遊行，能有對話嗎？或者如果4．22之後就有對話而沒有社論，還會有4．27嗎？

所以作為一名教師，我既感到驕傲又感到慚愧。我驕傲的是（清華正直的校友們都會為此驕傲的）同學們在這次運動中所具有的愛國熱情和正義感，為了自己所認為的真理而義無反顧。在運動中又表現出相當的思想水平和鬥爭策略（當然還要不斷進步），真正體現出了國家未來主人翁的姿態。也打破了我和我的一些同齡人所有一種擔心：處於這樣一個初級商品經濟的環境之中，社會上許多人帶有強烈的唯功利主義的味道，再加上青年們關心國家關心政治的熱情

又幾經磨難，這一代青年人怕是不會再有為國為民而不顧一己之狹隘私利的熱情了。記得去年底紀念“12.9”運動時，同學們曾討論過清華的傳統與國家的未來。同學們在這次運動中所表現出來的不就是清華傳統中相當重要的一部份嗎？在那些步行百里、不畏艱辛、不懼威脅，在遊行中充滿激情高呼口號的一些羸弱的女同學身上，又讓我看到了當年清華組織敢死隊時第一個站出來的龔彭的身影。

這也就是我之所以感到慚愧的一面：在這樣的推動社會進步的進程中，我們這些已有把年紀也有些經驗的卻不能成為推動的主力，也沒有站在最前沿。我只好在這裏以這麼一篇東西來為同學們站腳助威。

完稿於1989年4月29日夜

從電視轉播可以看出，這次對話來得太快，學生們還來不及做充份的準備，也沒有統一好策略。部份同學中途退場以示抗議，剩下的同學依然誠懇地提出了很多問題：領導層中的腐敗，教育的失敗，青年學生參與運動的熱情是不是出於愛國、希望中國發展得更好。其中政法大學的項小吉對遊行的起因及其合法性所提出的問題最為有力。

注意在這次對話一開始，袁木就有一個開場白：“李鵬總理特別讓我告訴大家並轉告北京高校的廣大同學，《人民日報》社論當中講到的關於否定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否定社會主義制度的政治鬥爭，是針對極少數人的違法行為說的，不是針對廣大同學說的。”其實一場大規模的群眾運動起來的時候，所有的政治勢力都想對它施加影響，黨和政府內的政治力量也不例外。只是哪一種影響更能在學生中引起共鳴，則與廣大學生的心態緊密相關。所以說廣大學生是愛國的而這場學生運動依然是動亂，就僅僅是一種伎倆絕無任何誠意。這一點在後來的發展中也暴露無遺。

4.27遊行到4.29對話，是學生運動的勝利，也是一個重要的轉折，又是一個關鍵的時刻。本來我們應該穩定已取得的勝利，在此基礎上擴大戰果。其實這個勝利的影響還在逐漸地擴展和深化，它的全部影響還沒有完全展現開來。但是學生們從這次勝利中漸漸膨脹起來，要求更急更高了。5.4又一次大遊行。趙紫陽在亞行講話，承認學生是愛國的。5.10日新聞界遊行，學生支持新聞界。胡啟立，芮杏文對新聞界有一個講話，表示新聞改革勢在必行。由此直到6.4，新聞尤其報紙確實有了相當的客觀性。這就是中國社會民主政治的實質性進步。只可惜中國的政治發展往往並不依據人們的善良願望和社會的廣泛呼籲，而更多地是被黨內權力鬥爭所左右的。

五 學生絕食

5月13日我離校回家（母親家），晚上接到電話：學生開始絕食我們怎麼辦？是也進行絕食還是以別的方式表示支持。我們商定寫大字報表示支持學生絕

食。事態發展太快，行動刻不容緩，很多問題來不及放開及深入地思考。實際上我們連大字報也沒來得及寫。第二天我趕回學校，我們決定遊行去天安門廣場，一方面表示聲援，一方面看看態勢。5月14日出發，我們先騎車到西單，放下車後步行。沿途都是各校的遊行隊伍。我們到廣場時，廣場上到處紅旗飄揚，絕食的學生集中在紀念碑周圍，其他學生席地而坐遍布廣場。

但是比起後來全市大遊行，這時廣場還不算太擠。我們還可以走到絕食同學的旁邊去看望和慰問他們。絕食的同學或坐或臥在露天的空地上，不少同學頭上戴著白布條，上面寫著絕食的目的和決心。有幾個學生讓來慰問的人在他們的帽子和衣服上題字留名。

五月的北京，白天有太陽的時候會曬得很，但到晚上又會很冷。所以絕食的學生需要棉大衣和雨傘。這時因為絕食剛開始一天，絕食學生也還沒有長期作戰的思想準備，各種條件準備得都不很充份。不過，各校和醫學院的醫務人員帶著急救物品已經守在絕食學生的旁邊。一個功率還不大的廣播站也在廣場上建起來了。不斷有各界人士通過這個廣播站向絕食的學生講話。在嚴家其和鄭義之後，我也代表在場的清華教師講了幾句話：“從你們身上，我們看到了新一代年輕人為國家為民族的大無畏獻身精神。因為有了你們，我覺得我們國家更有希望。也正因為國家的希望寄托在你們身上，請你們要多多保重。”

有一幕很感人：我的朋友慈恩和他不在清華工作的女友在慰問絕食學生的現場不期而遇。他的女友被絕食學生的精神大大地感動了，見到他以後還沒有說話，淚水嘩地就流下來了。這是善良和純樸人的真摯的眼淚。她看見慈恩時一定覺得在他面前最能與他分享和分擔她最真實的情感。

前一天晚上，李鐵映、陳希同和李錫銘到廣場上勸學生回去。但他們卻不能明確答覆，也沒有被授權來答覆學生提出的三個條件：

- 1，承認這次學生運動是民主愛國運動，學生是愛國的；由此，
- 2，不搞秋後算賬；
- 3，迅速實現學生與政府的對話並現場實況轉播。

後兩條多少是技術性的，第一條是原則性的。

14日當晚，12位著名學者：戴晴、嚴家其、李澤厚、劉再復、包遵信、李洪林、蘇小康、於浩成等來廣場勸學生一定要掌握好策略，並說要向黨和政府的最高層傳話。戴晴依著在葉劍英家待過多年，認識不少高層的老幹部，以為她能直接與上溝通。幾位學者讓大家等著，他們去找高層領導。

在絕食剛開始的幾天裏，在大家心裏有一種感覺或企盼：絕食是一種極端手段，在天安門廣場絕食更造出了緊迫的形勢，高層領導肯定不會置之不理的。當學者們說去請領導來，在廣場上聚集的學生很快就開闢出一條可以讓紅旗轎車開進來的通道，就等著趙紫陽或李鵬（沒人相信鄧小平會來）到廣場來對學生

講幾句暖心話，哪怕是官樣文章，然後大家就撤了。誰知等了一夜，任何回音也沒有。李鐵映和閻明復與學生對話代表團的對話也因學生的要求不能滿足而沒有進行下去。

也許領導們實在是太忙了，因為第二天戈爾巴喬夫來華訪問。所有的高層領導都忙著與他會談，沒有人來顧及學生們的情況。只是李鐵映、閻明復來過廣場再次勸學生回去。但學生們追問這次運動是不是愛國的，他們只能表示他們個人都認為學生是愛國的。當被追問承認是愛國的是政治局的意見還是個人的意見，他們只能承認是個人意見。並讓學生不要逼得太急了，逼得太急各方面都不好辦。閻明復已經流淚了，他是真的不希望學生們受到傷害。但是自己夾在中間很是難受。既勸不動學生又阻止不了決策者動刀子。這一點他自己很清楚，卻不能向學生們明說。

學生們在廣場是對戈爾巴喬夫的訪問產生了影響。歡迎戈爾巴喬夫的儀式改在機場舉行，而不是通常在的人民大會堂東門外。戈爾巴喬夫的車隊也從來沒有在長安街上通過。學生們在戈爾巴喬夫訪華期間就是坐等。什麼也沒發生。唯一發生的是趙紫陽會見戈爾巴喬夫時透露的信息：“重大決策還是鄧小平說了算。”結合閻明復的態度，不難推測出中央上層的分歧與權力的傾斜。

5月16日戈爾巴喬夫回國，應該說領導們有時間和精力來和學生對話了。但是中央上層沒有一點動靜，這裏當然是指對外界或新聞界。根據後來所知，鄧小平早就動作到外地調兵遣將去了。但是作為政府整體則對於學生的要求沒有一點回音。

到這時，學生已經絕食許多天了。戈爾巴喬夫也離開了中國。但是政府方面依然沒有一點對學生請願的回音。那幾天我們也住在廣場，每天早上新聞廣播的時候，我們都盼著能聽到中央對學生絕食的表示或對學生要求的答覆。但一連幾天都沒有什麼動靜，很令我們失望。

不僅我們失望，全北京各方面也都很著急。清華校長張孝文會同北京幾個高校的校長率先發表了一封公開信：要求中央儘快拿出辦法來解決當前的危機，不然絕食的學生們就會傷及身體甚至死亡。這之後，全國總工會，婦聯，團中央，各方面都動起來了。差不多各單位都組織到廣場遊行聲援絕食請願的學生。北京各個通往廣場的街道都是遊行的隊伍，全世界最大的廣場也被擠得水泄不通。這次遊行也創了歷史紀錄：自發的、規模最大的，參加的人最廣泛、最多。

這麼大規模的遊行給廣場上帶來了很大的壓力，幾十萬的人都要通過廣場，都想見見絕食的學生，而且這麼多人都沒有統一的協調和指揮，廣場上的擁擠到達飽和狀態。偏偏這時候，所有的交通、民警、武警不僅不幫助維持秩序而且從他們應在的崗位上撤掉了。交通崗亭，人民大會堂前都再看不見值勤警察的身影。我理解這是政府的陰謀：他們就等著亂，越亂才越有大打出手的藉口。但是高自聯做得很出色，迅速組織學生接管維持交通的任務。廣場上高自聯的高音

喇叭一會就會發一通 知：說哪需要人去維持秩序，請部份同學到紀念碑某側集合，會有人帶隊去。我們，和千萬個學生一樣，都參加了疏導人流，維持急救車通道的工作。

其實，從政府裏有人對學生搞陰謀就該知道他們沒有任何誠意要和學生溝通要尋求共同點。用極端手段對付這場運動只是時間問題，他們需要時間進行軍事上的部署和調動。學生們則陶醉在如此廣泛和浩大的群眾支持中，以為政府會承認失誤和做出讓步。

5月17日凌晨，趙紫陽有一個書面講話，完全撇開政治問題，只是勸學生保重身體，停止絕食，返校復課。聽著比他5月4日的講話基調還倒退了，所以沒有引起任何轟動效應。學生們的政治要求一點沒有得到響應，也就不停止絕食不撤出廣場。

六 聲援絕食



幾天下來，絕食的學生開始有休克的。5月16日藝術院校的幾個學生開始絕食絕水。在人民大會堂北門外，立起一幅巨畫，畫中是一個跪在地上的赤裸少女，她的眼中有著哀求、怨恨、悲憤的複雜心情。她當然就是請願學生的寫照：面對強權和暴虐，學生們所能做的只剩下請求，請求得不到回響就是悲憤。在畫像前一塊明顯的空地上，幾個絕食絕水的學生一字排開地躺著，身上蓋著白布。不遠有醫生和護士守護，不斷地對他們進行檢視，一有危險就趕緊送醫院。實際上有幾個是幾進幾出了：被送進醫院，打了點滴，搶救過來還堅持再回到絕食的現場。他們是置自己的身體和生命於不顧，要想喚起良知。

5月17號，清華教師一行隊伍來到廣場，繞場一週遊行。我們雖已在廣場多日，一看是更廣泛的教師隊伍也就參加進去。當隊伍走過絕食絕水現場時，那種壯士一去不復返的氣勢，那些年輕學生有一種為國捐軀的豪情，再加上幾天來都沒能引起上層政治領導的一點惻隱之心，使很多路過這裏的人都感到一種悲泣，一種震撼。很多人都忍不住要掉淚的。我的一個朋友，叫阿桂的年輕教師忍不住失聲大哭。

我理解他是一種情緒的大崩潰。因為我自己在這前後就大哭了幾次。我們是所謂生在紅旗下，長在紅旗下的。我們的國名專門要叫成：人民共和國。我們的政府一向自稱為人民的政府。共產黨的宗旨是為人民服務。人民群眾是共產黨的基石。人民群眾是水，共產黨人是魚；共產黨只有在人民群眾的支持下，才有生存的餘地，才如魚得水，也才有勝利的可能。這些觀念在我們腦子裏都是堅信不移的。到這時才真切地看到大權在握的人是不把人民群眾當回事的。這種哭是一種徹底絕望的悲泣。

阿桂完全不能自己，一直哭到暈倒過去。袁夕、蔡敖和我趕緊把他架上了

一輛救護車，那時候廣場上救護車真是到處都有，然後就被拉到和平門附近的中國紅十字會急救中心。這裏面早已是人滿為患，根本沒有空的病床，很多人躺在鋪了墊子的地上。進去後他先是被放在急救診斷床上，醫生護士對他進行了基本檢查。這時更多的病人被送了進來，他只好被抬到一張候診的長凳上，然後讓他喝生理鹽水和葡萄糖水。

這時，又有兩個學生被抬了進來。醫院裏實在沒有躺的地方了。阿桂也感覺稍好一點了，就掙紮地站起來把長凳讓出來。剛抬進來的兩個學生都是女孩子。一個是北醫的學生，她不是參加絕食的而是在廣場上參加急救和護理的，由於連續緊張工作多天給累倒的。另一個是人大參加絕食的學生，暈倒後被送進來的。送進來以後，已經醒過來。只是她已經四肢痙攣，手成了爪狀，根本不能支配自己的手腳。但她還是意識到她褲子前的拉鏈還開著，就示意護士幫她拉上。護士用浸過藥水的棉花給她擦和揉手關節，幫助促進血液循環和恢復知覺。她因為虛脫頭上還不斷地冒冷汗，護士又給她擦汗。

因為有更多的病人需要護士的照理，我們幾個人就接替了護士照料她。一個人給她揉手關節，一個人給她擦汗，還有一個人喂她喝牛奶和葡萄糖水。為了使她情緒好起來，我們又和她聊天，吹我們是學生運動多少年的老運動員了。她是人大一年級的學生，是二十歲還不到的孩子，正應該是被父母嬌養的年齡，卻義無反顧地參加了絕食。她母親專門到廣場來找她讓她回家。她堅持下來了，雖然知道很傷了媽媽的心。現在都躺在醫院裏了，說好了以後還要回去繼續絕食。

看到她好了一些，阿桂也好了許多。我們就離開了醫院回到廣場。後來北醫來車接他們的學生回自己學校治療，阿桂也搭車回海淀。誰知在路上又暈了過去，被留在北醫的校醫院裏打了一夜的點滴。這些我們都是過後才知道的。

人大小姑娘的倔強勁使我非常感動。回到廣場上以後，堅決要求參加絕食，說怎麼能讓這些年紀輕輕的學生們冒著身體和生命的危險去頂民族和國家的大任，而我們這些有把年紀的卻僅僅當後援呢？和我一起到過醫院的都知道我是因為受了人大絕食女生的影響而堅持要絕食的。後來我找了一個當聯絡員的我的學生，讓他把我弄到絕食團裏去。他進去聯繫了一下，回來告訴我裏面絕食的人已經很多，一個人絕食要有好幾個人來做後勤服務工作，勸我不要去。還說你這樣的人應該多出策略上的意見才對，不必去做（聲勢性）的工作。

我還真寫過一個東西分析當前局勢，托當時任廣播站負責人的周峰鎖轉交高自聯的同學。但是我知道當時給高自聯出謀劃策的頭面人物多得很，不需我們操心。我們還是做很實實在在的事吧。

第二天一早，我和蔡敖開始打掃我們在廣場安營紮寨的周圍。環衛工人也在幹。廣場上一下子有這麼多人待上好幾天，垃圾多得很。這麼多人集中在廣場上，臟東西再多，發生傳染病的可能性很大。而且一旦這種情況發生了，把學生們打掃出廣場的口實也就有了。我們倆在不少同學的幫助下，清掃了廣場東

側很大的一片地方。還幫環衛工人把如小山似的垃圾運到廣場外可裝車的地方。

18號，天下起了雨。北京市政府派了幾十輛公共汽車讓絕食的學生避雨。學生怕被車拉出廣場，把這些車輪胎的氣都放掉了。後來趙紫陽、李鵬就是到這些公共汽車上看望絕食學生的，才有了趙紫陽用他那濃重的河南口音講的“我們無所謂，你們來日方長。”趙紫陽還很沉痛地說：“我們來晚了。”其實攔不住對學生動刀槍，早晚也是沒區別的。

七 戒嚴

19日晚高自聯在政府宣佈戒嚴之前得到消息。戒嚴完全改變了矛盾的性質。政府決策者到此所表示的邏輯是：你在絕食請願時，我對你的請求置之不理。但表示對你的身體健康是關心的，所以請你停止絕食回家去。你真的回去了，你的行動就沒起任何作用也就失去了任何意義。你不回去，你不聽我的話，你就是動亂，就是擾亂社會治安。

正相反，北京市的社會治安在這期間是空前絕後的好。平時坐車騎車時有個磕磕碰碰的，火氣大心不順，就總有人要吵吵嘴罵罵街。而在學生運動的這個期間發生這樣事的時候，北京人都能以大局為重，互相謙讓。有一個說法，北京連很多小偷都罷偷了。某家報紙專門從市公安局拿到統計資料登在報上顯示出5月份的犯罪率是幾年來最低的。

但這一切都擋不住要對學生動刀子了。社會治安如何好我不管，你是擾亂了我的統治，冒犯了我的尊嚴，我是肯定要收拾你的。其實，還真說是關心學生們身體健康的，也只是趙紫陽、閻明復他們。那些辛辛苦苦玩著命打下江山的有幾位老將對娃娃們鬧事就恨不得拿機槍掃呢。哪還用那麼些惺惺相惜。

中央內部有良心無實力的人先把消息捅給了學生。面對這種政治的強權，絕食請願已經沒有了意義。高自聯宣佈改絕食請願為靜坐示威，表示對政府實行戒嚴的堅決反對。

北京市民對戒嚴都相當反感和氣憤。這也就是為什麼戒嚴剛開始時能把三十萬軍隊擋在北京城外的原因。這是一次真正的全民截兵！

19號當晚，我和一批學生在人民大會堂東門外拉成一道人牆，怕有過激的群眾衝擊大會堂。這一晚倒是沒有發生大的衝突。不過確是有年輕的北京市民手裏拎著大棒子出來的，也有一個跟我撩衣襟讓我看他帶著刀呢。說要和不講理的沒辦法講理就只能跟他們用這個了。我勸他們不要過於衝動，不要用暴力。整個這場運動是一個非暴力的運動，也不希望造成敵對的局面。他們卻笑我書生氣太足，因為其實戒嚴就是把我們當成敵人來對待的。

由一批騎摩托車的北京市民組成的“飛虎隊”自願到入京的各個主要路口

偵察戒嚴部隊的行進情況，發現情況飛馳廣場通報。順義，石景山，海淀，平谷，豐臺，通縣都有了部隊，北京火車站也到了部隊。北京已經被團團包圍。高自聯派出一些小分隊到各路口攔截部隊並向部隊進行宣傳。宣傳的材料不用別的，就用這些天來的《人民日報》和北京的其他報紙。因為這些天來報紙有相當的真實性。那些客觀的報導本身就很說明問題。但是攔截和宣傳靠學生是不夠的，主要靠的是北京市素有政治熱情的廣大群眾。我的朋友肖冬攔截軍車的經歷是很艱苦的，有必要記述如下。

肖冬和幾個學生20號早晨趕到六里橋一帶，很快就看到兩輛滿載武警的軍車向市區開來。他們攔住後向領隊的軍官解釋說：學生運動是愛國的，運動到現在為止，北京的安全和社會秩序都很好，沒有戒嚴的必要，請你們不要到城裏去。軍官明白他們是來攔截軍隊進城的，就下令讓軍車沖過去。肖冬一看勸說不行，當即和幾個學生躺在車前的路上。軍官命令幾個戰士下車把學生們抬開。把學生抬開後，兩輛軍車向前行駛了一段距離，然後停下來等那幾個戰士上車。就在這一會兒工夫，肖冬和幾個學生又跑到車前躺下。這時路邊有幾個當地的人圍觀，可是卻不敢上前幫忙。幾個回合下來，軍車開出幾百米的距離但依然沒有擺脫肖冬他們。這時才有幾個首鋼的工人路過，大聲招呼周圍的人幫忙。這才把兩輛軍車請到一個有圍欄的空場裏，然後把圍欄門關了，上了鎖。

這麼折騰完了，已經是中午了。不遠就有一家小飯館，老板請幾個學生吃餃子。肖冬跟老板說這兩車戰士只是執行命令，我們也應該對他們實行人道主義，也讓他們吃上飯。老板說他們就只能吃饅頭了。

吃完午飯，肖冬坐著和戰士們聊天。由於體力和精神都緊張了半天，消耗很大。再加上在廣場上待了數日，身體已經很虛弱。坐下來一放鬆，他一下子就暈了過去。等到醒過來他已經躺在一家醫院裏。他身上穿的我的棉衣也不知去向。後來我們見了面知道了他的經歷，我跟他說棉衣丟了我倒不是很心疼，只是棉衣兜裏的一盒剛拆包的三五煙卻是我們在廣場上僅有的奢侈品，沒了可是再好再弄到了。

我沒有趕上去堵軍車，一直留在廣場上。20日天亮以後，幾架軍用直升飛機在廣場上低空盤旋，隨著直升飛機發動機的轟鳴和由於低空而投撒在人群頭上的巨大身影，使廣場上的火藥味頓時彌漫和濃郁起來。包括我自己在內，廣場上大部份人都是沒有見過這種陣式的。即使這只是一種威脅，它的意思也是再明確不過了：我們已經被當成敵對勢力，政府準備用任何可能的軍事手段來對付我們。不少人有些驚慌，我卻非常憤怒。要知道北京上空過飛機都是有著嚴格限制的，一定要得到最高當局的批准。轉念一想，有什麼可生氣的呢？這太容易理解了。嚴格限制過飛機主要就是為了首長們的安全，現在讓飛機在北京上空亂飛也還是為了首長們的目的。只是知道首長們的利益是高於國家和群眾的利益，心裏還是有些淒楚。

有人建議在廣場上放風箏和氣球，以阻止直升飛機在廣場上降落或空降部隊。很快就有風箏在廣場上飛起來。後來直升飛機沒有在廣場上降落或空降部隊。

但是又傳部隊要坐地鐵從石景山運到市中心來。我們就隨著一批學生到市中心的幾個地鐵車站去把門。

我們剛趕到地鐵站時，地鐵還通車。出來的乘客告訴我們地鐵就要關閉了。這就是一個信號：地鐵的對公眾關閉是為了運送軍隊的。等到地鐵停止運營後，我們把地鐵出口的大門關上，有人送來了鐵鏈和鎖，我們把地鐵大門從外面用鐵鏈鎖上。真要有衝突發生的時候，這個拿鑰匙的人是要承受最大的壓力也要負相當的責任的。我就向學生把鑰匙要了過來。

我們當時都有大敵當前的感覺，都準備與戒嚴部隊有一場面對面的衝突。但是這個衝突會是什麼樣的，軍人會用什麼手段來對付我們，我們並不清楚。但是我們要有最壞的打算。在充滿懸念的等待中，學生們開始寫絕命書。有幾個學生爬到地鐵站口的房頂上用手提式擴音器宣讀同學們寫的絕命書。我覺得這種氣氛太悲壯，太沉重，也就寫了幾句話來鼓勵他們。大意是：我們一向要教育我們的學生正直、勇敢、誠實，現在學生們就充份表現出了這些好的品質，希望不要發生任何事情把這些品質打得粉碎。一個女新聞記者也講了許多話。另有一個說是北大的學生，又是一個地道的北京人，用他那詼諧和調侃的地道京腔講他自己的故事。

我們在地鐵又從白天守過了一夜。當晚不斷地有各種消息傳來：一會兒是鄧穎超反對鎮壓學生；一會兒是徐帥說誰向學生開槍他就槍斃誰。在地鐵站頂上的人用手提擴音器率領大家喊口號，“打倒李鵬”的聲音響徹了北京城。

這一夜並沒有軍隊從地鐵站出來。但是地鐵停止運營了三天。可能還是運了軍隊的，不是運到廣場上而是運到大會堂裏。6月2日在六部口搶槍支的部隊和6月4日凌晨驅逐廣場學生的部隊都是從大會堂裏出來的。這些部隊很可能就是靠地鐵運進去的。

第二天天亮戒嚴仍然沒能在北京實施成。北京市區依然是人民群眾的天下。很多人奔走相告：我們勝利啦。我不很明白是如何勝利了。有人說按國際慣例戒嚴24小時後仍不能實施就自動取消了。

八 五月底

不知是不是真有一種這樣的國際準則，反正北京的戒嚴並沒有取消，緊張的氣氛仍然存在。民間的各方人士仍然在努力想各種辦法來化解一觸即發的流血衝突。一部份人尋求體制內的渠道來解決，建議召開人大緊急會議。他們徵集人大代表對召開緊急人大動議的簽名，我家的一個朋友也簽了名。但是中國的最高權力機關從產生到行使權力其實都是受控於最高權威人物的。所以當然沒有成事。

科技大的學生則到聶榮臻和徐向前的府上求見，並遞上了一封信。信中向

二帥報告說：李鵬召集會議做出四點決定：1，稱學生是在搞叛亂；2，要鎮壓天安門廣場上的20萬大學生；3，已騰出北京各大監獄；4，明晨5時所有環衛工人上班清掃天安門廣場。請二帥能出來說句公道話。兩帥是否接見了學生不太清楚，但他們的回答是相同的：“一，信中所言四條純屬謠言，請同學們不要輕信；二，軍隊到北京來實行戒嚴，完全是為了維護首都的社會秩序和安定，希望同學們協助解放軍做好這一工作；三，希望同學們為了國家的尊嚴、首都的秩序、市民的生活、自己的健康和學習，能儘快撤離天安門廣場。”他們的回答多大程度上是他們自己的想法，從回答的一致性中可見一斑。

第二天，鄧穎超發表了意思大致相同的書面講話。他們都一反高級領導人慣常的那種高屋建瓴，務虛為先，以大道理服人的講話作風。不對運動的起源發展及性質做任何評論而直接具體到請學生撤離廣場。

戒嚴部隊暫時駐紮在北京郊外，不再與老百姓接觸，也不再看當時的報紙，而是集中學習總政治部組織整理的文件。最初戒嚴帶給大家的緊張氣氛多少鬆弛下來了。

不那麼緊張了，我們就開始往學校跑。因為連續在廣場待了許多天，大家也需要調整休息，晚上不再在廣場過夜。回到學校，我寫了一篇稿子由高戈在清華的廣播站上播了。這篇稿子是討論缺乏政治民主給中國帶來的危害。後來我被審查時好象也沒有提及。出國時我把稿子也帶了出來。沒想到我的一個朋友就借用它在加拿大申請了居留權。

我們都撤回來了，廣場上就空曠了許多。但是因為香港捐了許多帳篷支在廣場上，外地來京的學生也還生活在廣場上，廣場上依然是學生的天下。北京也還是民眾的天下。但是形勢會怎樣發展？戒嚴宣佈一個多星期了，既沒有實施，也沒有取消。

戒嚴的行動也不是完全停下來了，還有飛機到高校來撒傳單。這次飛機飛得比較高，傳單撒的數量也不是很多。傳單也沒比廣播報紙上有更多的內容或更說服人更親切感人的東西。所以幾乎沒什麼人注意這些傳單，也沒有人因為撒傳單而進一步地的驚慌。不過從這一舉動可以看出當時決策者幾乎試用了所有可能的手段。還沒有嘗試的就是領袖人物的個人魅力和敢於面對群眾的魄力了。試想如果一位領袖堅信自己決策的正確，堅信自己政策是為大多數人民群眾、民族、國家的長遠利益服務的，他就不怕直接面對千百萬的群眾，就不怕和高自聯或“幕後的黑手”來爭奪群眾，向人民曉以大義，動之以情，以言退“兵”。

用盡了各種手段的另一表現就是陳希同組織他經營多年的昌平縣農民進京的反遊行。據說他們的遊行是經過申報批准的。是先批准的還是先申請的就知道了，總之批准的手續是很快的。據傳參加遊行的還有補貼。以遊行來反遊行本身就有些滑稽。

5月28日有過一次全球華人大遊行，要求解除戒嚴召開人大。國內各大

城市遊行自不在話下。據說在各國的留學生也都到所在國的中國使領館前遊行並遞交請願書了。我的一位大學同學當時在英國，遊行時高舉大旗。後來有些同學要衝大使館，他能做到舉旗不動。緩解了留學生們可能會給中國駐英使館造成的更大壓力。為此立了一大功。我之所以這麼說，並不是他自己告訴我的。而是我後來被審查批判時，清華有人以他的事跡為例來對比我們在同一個班裏出來的，他在政治上是如此堅定而我在政治上卻這般的“不成熟”。

我在外地工作的朋友緯文自己安排自己出差來京看看局勢。5月底我陪他到廣場看民主像樹立。這時的廣場與絕食期間的廣場又很不一樣。絕食期間廣場上基本都是學生或是學校的教師。因為怕有特務混進來，曾經還實行過檢查證件的制度。所以很少有外人在廣場上。現在廣場上什麼樣的人都有，而且不像絕食時的學生那樣有著更多的神聖和緊張。緯文和我還在三輪板上買了現攤的煎餅吃。這也與絕食期間，各種供應品都是籌募和捐獻的大不一樣。在廣場上依然還有這場運動的神聖和嚴肅氣氛的就是民主塑像的樹立了。

六一兒童節先是有人在報上抱怨，說學生佔據了廣場，兒童們沒有地方搞紀念活動。6月2日報上有一小塊新聞專門報導六一那天廣場上學生與少年兒童共同聯歡慶祝兒童節，氣氛融洽，兒童和學生都很愉快。不僅是兒童們和學生聯歡，一些大腕的歌星也到廣場來為學生們演唱。象著名的搖滾樂歌手崔健就來廣場唱過歌。

為了抗議戒嚴，知識界曾醞釀過五千人的六絕食。我想知識分子中反對戒嚴的何止五千五萬。但是能有勇氣又能有同一的意志和策略，對於知識分子來講就太難了。後來就成了6月2日劉曉波、侯德健、周舵、高新的四君子絕食。劉曉波在絕食宣言中說絕食：“是抗議以李鵬為代表的政府用非理性的、專制的軍事管制去鎮壓學生的愛國民主運動”。

我和劉曉波在廣場上有過一面之交。我對他從國外趕回來參加這場運動非常欽佩。也對他的結巴和抽煙兇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我當時煙抽得也很厲害。我們的談話，好像還有人大的一個青年教師在場，就是在互相敬煙中進行的。

九 六四

6月2日晚，軍人著便衣步行向廣場滲入。他們三三兩兩在一起，穿白襯衣藍褲子。他們太容易被認出來了。士兵清一色的寸短頭髮，再加上沒有受過撒謊或演戲的訓練，所以他們的緊張神情都把他們自己給暴露了。要是再一開口說話，一定不是地地道道的京腔。很快大街上的人就開始攔便衣軍人。很多便衣軍人只好躲到群眾住家和機關的院裏，他們大都沒有完成滲透進廣場的任務。有多少軍人進入廣場？進入廣場又待在哪裏？我們都不清楚。

便衣進入廣場的軍人，沒有軍裝和武器，什麼事情也幹不了。他們的軍裝和武器是另由大轎車運到廣場的。這就是群眾在6月2夜裏和6月3早上在西單

和六部口一帶攔下的那些大轎車。這些車內有機槍和自動步槍，有軍裝，還有菜刀和石塊。這些菜刀和石塊不是為了軍人對付群眾準備的，而是為了栽贓學生和群眾所準備的。這一點我們當時還不清楚。6.4之後，蔡敖找到了一集《文史資料》。其中有一篇回憶錄專門講國民黨1948年是如何鎮壓昆明大學生鬧學潮的。國民黨軍人先包圍了學校，把學生困在樓裏。僵持幾天後，軍人就在校園內撒了許多石頭，然後說學生發動暴亂，進而以此為藉口開槍鎮壓學生。國民黨四十年前的伎倆，共產黨現在照用不誤。菜刀石頭是要丟到廣場上，為後來說“北京發生了反革命暴亂”提供口實。

這些被攔的大轎車停在原地。車內的槍支被放到車頂上展覽：請看這就是政府準備用來對付我們的家伙。沒有人說要也沒有人想到要用繳獲的槍支來武裝自己以與戒嚴部隊相對抗。人們只是對政治的請願要被用軍隊來鎮壓感到非常的憤慨。

6.3中午前後，一隊頭戴鋼盔全副武裝的軍人沖到六部口被截車輛處去強奪槍支，與聚集在那的群眾發生了衝突，一些群眾被傷。這隊軍人則被圍在人民大會堂西門外。

我們是在聽到了這個消息後才從清華趕到城裏的。在西單看到了展在車頂的機槍。在六部口的大轎車旁，一些人向我們介紹發生的情況：軍人如何沖散了群眾，如何打傷了人。一個人指著提包上的紅點子告訴我們：軍人向群眾扔了催淚彈，還扔了另一種彈，炸開時會有紅顏色的東西濺出來。據他說這種顏色濺上了就不容易洗掉，可為事後追查在場的人提供幫助。

然後我們又到人民大會堂西門外，看那些執行完任務後被群眾圍住的軍人。這批軍人有一個連以上的人，我們到的時候他們是很安靜地坐在地上。能夠看出他們是執行過並且還能執行任務的特徵是他們頭戴的鋼盔和天線高聳張開的好幾部步話機（和《英雄兒女》裏王成沖著大喊“向我開炮”的步話機一樣）。

群眾中有一位婦女指著坐在士兵當中的某個戰士說：“就是他打的人！”但是很快就有一個也是群眾模樣的人出來說：“我們現在不擴大衝突，要堅持非暴力的運動。”然後就指揮群眾唱歌。後來又拉軍人們唱。群眾依然唱《國際歌》和《國歌》，而戰士們則唱《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

大會堂樓上窗口裏不斷有軍人探出頭往下看，群眾中有人注意到了也就抬頭看他們。這種看很快就成了互相敵視，還發生了短暫的口戰。軍人們很快從窗口後消失掉了。

廣場上的氣氛已經很緊張。但是民主大學的成立典禮照常進行。許多學術界名流都在其教師的行列中。廣場的廣播站仍然在播送劉曉波的一篇文章：希望這場運動仍以和平方式為主，並依一定的民主程序進行。雖說要求罷免李鵬，但仍讓李鵬發表他自己的意見，給他申述的權利。並據理力爭，說現在的局勢是政府中一部份人不能及時對群眾要求做出反響，卻不斷以錯誤方式對待群眾運動所致。沒有積極主動地尋求共同點，導致了矛盾的激化。

晚6點，廣場上的官方廣播開始宣佈“北京發生了反革命暴亂，要求所有人離開廣場。”群眾有些騷亂，四君子和高自聯仍堅持非暴力，要求把收到檢到的武器都交到在紀念碑上的高自聯指揮部。劉曉波還情緒很激動地要砸爛一支槍。他有策略的考慮：不希望有武力的反抗給政府的鎮壓添加口實。但在我看來他還大有這樣一種氣概：我們要以正義做後盾，以筆和語言為武器，這種武器是衝擊和觸及人的思想。我們再也不需要也不應該要那些傷及乃至消滅人的肉體的武器。使用傷及肉體的武器來解決思想分歧的人首先就表示了他在人類所特有的那種高級的表達、溝通、理解方面的無能和道義的失敗。有權力而無能力用語言和思想來征服人的人才會用火力的武器來消滅人、壓服人。

廣場上的官方廣播和從各方面傳來的消息都令這一點確信無疑：政府這回是要動真的了。軍隊正在從各個方向向廣場挺進。

9、10點鐘的時候，一種轟鳴的噪聲由遠而近。一輛裝甲車率先單獨到達廣場並高速地環繞廣場，似要也確實給廣場上的人以威脅和警告：軍隊是擋不住的，是隨時就能到達廣場的。我想，後來就是這輛裝甲車被人用隔離墩攔住並燒掉的。

很快前門一帶吵嚷聲頓起。我和簡雷趕緊跑過去。一隊軍人跑步到達了前門腳下，一些人在追著向他們扔石頭和瓶子。我跑到軍人跟前，一邊高聲讓人們不要再扔石頭了，一邊又責問軍人：“你們來幹什麼？你們能下得了手向人民群眾開槍嗎？”許多戰士被這種局勢嚇得夠嗆，神情很緊張。一個幹部模樣的說：“我們被告知是來保護夏收的。”“天安門廣場哪來的夏收？”這個謊也編得太離奇。有一個戰士氣憤地拉開槍閂給我看：“我們的槍裏沒有子彈。我們怎麼會向人們開槍？”我注意到有個戰士扛著一箱東西。我如果沒有搞錯那就是一箱子彈。只是他們沒有發到每個戰士的手中。看來這是基層領導做的決定：下決心不用開槍的方式挺進到廣場。

戰士們都戴著鋼盔，扔來的石頭和瓶子砸在上面叮當作響。我在和他們談話的時候，還不時地要回頭躲扔來的石頭。有幾個學生也趕來勸阻戰士。我讓他們要小心石頭。因為我們是沒有鋼盔可保護的。

這隊軍人到此就不前進了。看來他們沒有要進入廣場驅趕學生的任務。看到他們沒有要進一步的行動。也了解到他們對北京發生事情的前因後果一點也不清楚，他們只是執行上級的任務，和他們再多的解釋也不會有什麼意義，我就回到紀念碑旁。這時天安門前的金水橋畔，歷史博物館前的灌木叢後都已有大隊的軍隊了。半夜12時前，廣場已經被軍隊四麵包圍了。後來知道雖然廣場已經被包圍，但沿西長安街挺進的部隊遇到了街壘和群眾最頑強的阻攔，仍然在以猛烈的射擊向廣場推進。所以沿西線從公主墳到南長街被打死打傷的人最多。

體批注】★★★)被包圍後的廣場上，不時有流彈或曳光彈在廣場上空呼嘯而過並在黑幕中劃出一道道光線來。在廣場東側，有一個醫護人員被流彈所傷。就在這種情況下，《中國青年報》等幾家報的記者還到廣場中心，拿著錄音機來採訪。他們問現在情況怎麼樣？我們又打算怎麼辦？就在我們談話的時候，一顆子彈落在我們身邊2、3米遠的一頂帳篷上。我勸記者們趕緊離開，因為這裏有生命危險。這種危險又何嘗不是對我們？這區別是：我們自認為我們是這場運動的一分子，是自覺自願參加的。發生任何事情都是我們自己行為的後果，我們並不後悔，我們已經作了最壞的打算。而記者是局外人，他們出了任何危險都是意外的損失。

十 撤離廣場

到這時，在被團團圍住的廣場中，我們已經是擱在案板上的肉，就等著被切割了。廣場這時又像颱風的中心，外圍打得很利害，廣場卻相對安靜了許多。我們幾個甚至趁著這短暫的平靜，還鑽進一個帳篷裏打了一個盹兒。

6. 4 凌晨四點正，廣場上的燈全部熄滅，戒嚴部隊對廣場上學生的行動就要開始了。最後的時刻就要到了。學生廣播站要求所有學生都聚集到紀念碑上來。一直沒睡的賈毅趕緊把我們幾個睡著了的叫醒。我們也到紀念碑上與還在此的上千學生守在一起。

官方廣播再一次要求所有人立刻離開廣場。借著廣場上幾個火堆的光亮（可能是高自聯燒文件的火堆），我們可以看到從人民大會堂裏出來了很多頭戴鋼盔，身穿迷彩服，手持自動步槍的士兵。他們謹慎緩慢散兵遊勇般地向紀念碑移動，然後對紀念碑實施了小圈的包圍。

其時，四君子已與戒嚴部隊的指揮（並不知道是哪一級的）交涉過，他們答應勸學生撤離廣場，而要求戒嚴部隊不要對學生開槍。但是高自聯廣場指揮部仍然要履行自己的領導職責：要以民主程序決定是去是留。據說是封從德要求大家以聲音來表決是“堅持”還是“撤離”。因為我還抱著“正義在我，奈我何為？既使把我打死，也給國人和世人以警示”的心境，所以喊的是“堅持”。依我聽來，“堅持”的聲音喊得比“撤離”的更響。因為喊“堅持”的人心裏有一股氣，喊得就有力。而喊“撤離”的人心裏已有些怕，喊得就不夠有力。但四君子一直在勸學生：“我們已經死了一些人了。你們青年學生是中國的未來和希望。再犧牲你們一個都是對民族的犯罪。”（誰犯罪？死者自己，還是劊子手，還是行兇的指揮者和執行者？）

高自聯的廣場指揮剛剛從廣播喇叭裏宣佈了撤離的決定。包圍紀念碑的士兵就開始向紀念碑上的喇叭開槍射擊。廣播站的喇叭是安在浮雕像上邊東南角，是高於聚在紀念碑上人群的。士兵是在紀念碑南側臺階幾米外的地上射擊。從地面到浮雕像的射擊仰角，使子彈就是從學生的頭頂上擦過。子彈打在紀念碑的花崗岩座上濺出了許多火花。射擊的槍聲，子彈的呼嘯聲，再加上飛濺的火花，

年輕學生們大都只在電影中見到過這種場面。學生中有的人開始哭了。這當然是被嚇的，不只是被這場面嚇的，更主要是意識到自己完全沒有了保護。長這麼大，一直是有家長，有老師，有政府保護的。現在是被政府派的荷槍實彈的軍人以敵人相對了。我們幾個是教師，也很想保護學生。但是我們所能做的就是和他們在一起，比他們要鎮靜一些而已。

我們因為是最後聚到紀念碑來的，所以待在紀念碑最底層的臺階上。在最後時刻的這個“我們”是我的幾位朋友：蔡敖，肖冬，賈毅，慈恩，簡雷，高戈。他們有的是我相識多年的，有的是在這次運動中才結識的。好像作為教師的群體堅持到最後的只有我們這撥。我們在紀念碑的最底層，以為士兵驅趕在紀念碑上的人會從底層開始。誰想，學生突然從我們的背後湧過來了。我們把學生讓過，才看到軍人是從紀念碑的最高層臺階往下驅趕學生的。後來通過官方的報導才知道是一個偵察排靠人梯直接登上了紀念碑的最高層，“搗毀高自聯指揮部”。也才有從上往下的清理紀念碑。

士兵已經沖到了我們的背後。一個士兵用槍對著我惡狠狠地喝道：“快走！快走！”被這麼粗暴無禮地對待，我的血直往腦袋上沖，回敬道：“你沒看見我們是有秩序地離開嗎？讓學生們先走。”另一個看似班長排長的軍人過來打圓場：“抓緊時間，只要離開就行。”朋友們也來拉我別跟軍人吵了。這最應了“秀才遇上兵，有理也說不清。”

學生們從紀念碑上離開從心情到狀態都很慘。有人抬著擔架從紀念碑上下來了。擔架上是誰看不清楚。我當時以為是四君子中有誰絕食後太虛弱了。有的人鞋掉了，有的哭得泣不成聲走不動路，要由別人架著走。蔡敖及時地用他的男中音領唱起“國際歌”，大家都相應起來。悲壯的歌聲頓時就使氣氛大不一樣了。

我們幾個是最後離開紀念碑臺座的。我和肖冬還在士兵的槍口下，搬運了一個高自聯的物品走。因為帶了這件東西，我們沒有留在撤離隊伍的尾部，而是快步走到前面去了。

離開紀念碑時，仍有一個外國攝影記者組在拍攝我們撤離的情況。他們好像是一家西班牙電視臺的記者。另一位外國記者在用大哥大報導廣場上的情況。後來聽說美國某家大臺對這天北京的現場實況報導就是聽到記者的聲音說“他們在打我了”才中斷。我猜想可能就是這位用大哥大的記者。

留在後面的慈恩後來告訴我們，對最後還留在廣場上的人，士兵先是用木棍驅趕，後來又開了槍，就在他跟前打中了一個人。他的傷口流了很多血。慈恩和在場的幾個人先用一面紅旗給他臨時包紮。救護車來後，醫護人員用繃帶包紮他的傷口，然後把他送到醫院。慈恩就把浸透了血的紅旗留下了。

撤離的學生依然高喊：打倒法西斯。這時廣場只留下了一個出口，其他地方都已被軍人封鎖了。我們是從廣場的東南角撤出的。到前門一帶街邊才有了群眾目送。在廣場上待了數周的學生們最後離開。他們很多人眼中都含著淚水。

我們從前門到和平門（北京已經沒有了和平），然後從六部口拐上長安街的。幾千人的隊伍也拉得很長。我和肖冬推著一輛自行車，車上推著從廣場上運出的物品。當我們走到郵電大樓旁時，後面傳來坦克的轟鳴聲和學生的叫罵聲。我們回頭一看，是一輛坦克沿著馬路邊沖著我們這支隊伍開了過來。我們的隊伍一直是在馬路上走的。這時候學生們只好趕快跳過欄杆到人行道上來。同時大聲斥責軍人的挑釁行為。

我和肖冬推著自行車帶著東西，跳不過欄杆也無處可躲。就靜靜地看著坦克要拿我們怎麼辦。也許我們的平靜中就透著一股凜然。坦克在我們跟前停了下來，就地掉了一個頭。一個士兵從坦克的窗口裏探出身來，嘻嘻哈哈地向我們扔了一顆手榴彈。我們既不臥倒也不躲，大概也來不及了，也許還覺得在首都的大街上被中國人民解放軍打死也是很“榮幸”的吧。還好這顆彈並沒有爆炸，而是放出很濃很黃的煙來。想必是一顆催淚彈。扔完了這顆彈的坦克又沿著原路往廣場開回去了。

我們拿出手巾捂住口鼻。這顆彈放出的濃煙，味道很重很不好聞。但奇怪的是並沒有使我要流淚。走出好遠了以後，這個味道還在。看來是附在我們衣服和身上的。也許它的作用就不是催淚，而是事後來辨認你的。

軍人們很清楚用坦克來對付我們這些人太輕而易舉了。就像貓捉老鼠：捉了放，放出去再捉——在蹂躪獵物的過程中提高技巧享受樂趣。所以坦克內的士兵顯得那麼輕鬆，甚至是幸災樂禍。也不知道他們這麼碾學生是否有使命，要殺殺學生的威風。還是他們自己要過癮取樂。

在西單，我們與大隊伍分了手。一位農大的學生要我寫下我的姓名、地址、單位。我也顧不上是否會有事後的危險，也是對這個學生的無條件信任，在一張紙上寫下給了他。

在復興門附近，我找到了我的自行車。除了倒在地上，也許就因為倒在地上，竟然還完好無損。要知道它也是歷經了昨夜的槍林彈雨。

我和肖冬先到我母親家。我按了門鈴。我母親和我姐姐一起趕來開門。看到我，連話也說不出來，一個抱住我，一個抱住肖冬就大哭起來。雖然她們根本就不認識肖冬。只是感到我們兩個是從死神那裏逃出來的。我說：“我不是活著回來了嗎，快別哭了。先讓我們進屋吧。”

我母親和姐姐為我擔心極了。昨晚一夜槍聲，流血死傷的消息也傳開了。天亮以後，又傳廣場上的人也都死了。前一天我並沒有和家裏聯繫告訴她們我去那。她們只是憑對我的了解知道，依我的性格我肯定會去“前線”的。她們互相都沒有說，又都猜想了最壞最壞的可能。

十一 清華死了四個學生



昨夜槍聲大作時。在和平環境裏居住幾十年的大部份人都沒有意識到會有多嚴重，以為最多也就是橡皮子彈。很多人家裏亮著燈就趴在窗戶上往外看。我母親經歷過二次世界大戰，有許多親身經歷的實在經驗。當時就喊“快關燈！快關燈！”左鄰右舍的幾家很快都關了燈。

士兵們被授予了在京城裏開槍的權利。如果說這場運動在千千萬萬參加的群眾中會有幾個不會掌握政策，有所過激行動，甚或是趁火打劫的也並不為過。如果因此 就可以否定這場運動長達七個星期的和平性質，那麼，在得了開槍命令的上萬士兵裏，進了北京這樣的大城市，又是在晚上，誰知道他們會有什麼樣的心理活動，又 會有什麼樣的舉動呢？誰又能保證士兵們開的每一槍都是為了向市中心推進，為了佔領廣場，為了在北京實施戒嚴呢？簡言之，在那種條件下，無法保證士兵們開的 槍都僅僅是為了實現最高政治領導的戰略意圖。

西長安街沿線好些亮燈的家裏打進了子彈。最高監察院某一副監察長的女婿就是在木犀地臨街的家裏中彈身亡的。他是到窗戶臨街的廚房去給他的孩子拿牛奶時被 從窗外射進的子彈擊中的。另一個女孩因趴在亮燈的十幾層樓上的窗口往下看，就被子彈打穿了脖子。還好她撿了一條命，卻留下了疤。後來我親眼見過她。脖子前 面子彈進去的孔（疤）小，脖子後面子彈出來的孔（疤）大。這是否為說明士兵使用了何種子彈有所幫助，我不懂。只能請專家們來判斷。

我不能相信這些都是流彈所為。為了掃清阻攔部隊前進的人群，開出的槍也不可能向高樓上飛。更何況還這麼準。我認為這些打到亮燈家裏的子彈是來自瞄準的射 擊。只是這些射擊的動機是什麼？我們也許永遠不可能知道了。但我絕不排除只是為了一時興趣，就是為了好玩：你京城裏的人可以趴窗戶看著玩，我也就可以（而 且也被允許）開槍打“獵物”打著玩。或者會是其他任何一瞬間的心理活動所驅使的。我倒是很想聽聽當事士兵來敘述，是在什麼樣的背景下，有什麼樣的上級命令 及暗示，以及在什麼樣的內心活動下開的那些槍。

戒嚴部隊中還有從中越邊境戰場上下來的。在那兒他們與越南人打得一點也不痛快，既不能宜將剩勇追窮寇，也不能揮刀血刃殺頑敵，甚至連有沒有消滅又消滅了 多少敵人都不清楚。這次在京城可是痛痛快快地打了一個“大勝仗”，讓“敵人”毫無招架之處。其實這場民主運動的參加者們在自己被打殺之前從來就沒準備與誰 進行武力的對抗。

6. 4 死了多少人，各個人死的情況，丁子霖 教授通過艱辛的調查掌握了很多材料。在這裏我只想講一下我所了解的清華死亡學生的情況。清華有兩個學生是在西長安街一線中彈身亡的。他們中的一個被打中後 還清醒，並相當平靜地對在場同學說：“我被打中了。”這個從未經歷過戰爭的殘酷和死亡的恐怖的年輕而天真的學生，對於政府會用如此極端的手段毫無思想準 備，當時都不理解被打中了意味著什麼。在這兩個死亡的學生中，有一個是段祺瑞家族的後代。如果他對祖上有過研究的話，他應該知道政府對於槍殺它的臣民從來 都是不手

軟的。只是我們受了太多的宣傳，太相信當今的政府是如何與以往歷屆政府都不同，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結果他就被這個政府下令的槍彈所射殺。

另一個清華學生是在前門一帶與戒嚴部隊發生衝突。當他已經躲到一條胡同裏後，士兵追到胡同口開槍把他擊中的。對於這種追殺我也很難理解是實施戒嚴的必要。

在官方的統計報告中，清華只死了以上三個學生。其實清華還有一個死亡的學生，只是他的死是到了很晚才得到確認的。他是一個從外校考到清華的博士生，在清華待了還不到一年。他失蹤後，親屬和學校也到各醫院的停屍間去認過。因為一顆子彈是從他下巴底下射入頭部射出而使他的面部不可辨認。我想任何人的親屬也極不願意相信這就是他們的家人。他身上也沒有任何身份證明，只是有一串鑰匙。最後決定拿這串鑰匙到清華的宿舍試一試。據說試的人隨著鑰匙在鎖中卡噠一聲的轉動，他（她）的心也一下就沉了下去。這才證明了好久沒有被人認領的這個死者就是清華失蹤的博士生。這裏還請注意，從子彈射入的部位和角度可以判斷他是在躺倒在地上以後才被擊中的。

我雖然很想知道每一個士兵在向群眾開槍時的心情與想法，也希望時到今日他們會有良心上的自責和追悔。但我並沒有要去追究那些士兵的責任。最應該被追究責任的是沒有積極解決政府的官僚腐敗、政策失誤、專權統治與人民群眾的矛盾，沒有努力尋求與學生和群眾的基本共同點（如果還是從為這個國家，這個民族和人民的好心而出發的），卻做出堅決武力鎮壓的決策者。誰也不應該用他們可能有過的任何功績來遮蓋和掩飾這一歷史的罪責。而且這一罪責也不因死亡人數的多少而有本質的變化。因為確有人在死亡的人數上大作文章。所有在這次事件中死去的，不管是學生群眾還是士兵，都應該有權利在這個世上活下去，又都是這一決策的犧牲者。如果我們有可能對所有死亡的學生、群眾做案例調查的話，他們大部份都會象丁子霖教授的兒子那樣，既是非常年輕、又相當優秀，會是中國社會未來的棟樑。死者沒有一個是暴徒。真正又暴躁又屠殺的就是決策的制定者。因為這個決策使基層部隊對運動產生了很大的疑惑和相當的抵制；還有實施這個決策的督戰者，就是他們下令對手無寸鐵的學生和市民發動軍事進攻，造成全面敵對狀態，死了這麼多人的。

我們到了我母親家裏沒多久，就聽說坦克在六部口碾死了人。坦克沖著學生們碾我們是親眼看到的。我們甚至就很可能也確實差一點就成了坦克履帶下的死鬼。我們急著和回清華的人通電話詢問有沒有我們認識的朋友被碾在下面的。在校的朋友也非常擔心我們的安全。我們認識的朋友裏倒是沒有被碾著的。但是坦克碾了人是確鑿無疑的。我還是很不明白，已經佔據了廣場的軍隊，還要用坦克追著學生並碾死學生。這真是為了實施戒嚴的戰略部署而必要的殺生嗎？

十二 燒軍車在鎮壓之後



6.3 夜裏留在清華的袁夕等幾個朋友也以為我們在廣場的人是不能活著回來了。他們一邊大哭一邊罵地把手邊的瓶子都從樓上的陽臺砸到外面的地上去了。砸瓶子一方面就是發泄內心激憤的情緒，另一方面本身就是一種政治口號。

6.4 回到學校的清華學生在西階教室召開會議。在歷經政府開槍鎮壓，坦克碾人取樂，同學有死有傷之後，年輕的學生們怒火中燒，熱血沸騰，討論的是如何與政府的惡舉繼續進行鬥爭，有必要就轉入地下。清華校領導有人在場旁聽。在場的幾位校級領導對學生的心情表示理解並婉言勸學生不能採取任何暴力行動。要知道他們也可以把這些學生交給戒嚴部隊當作暴徒處理。當然他們要這麼做了，以後也就別想在清華學生中能有任何威信了。清華領導和其他幾所高校領導曾聯名上書中央希望政府儘快採取措施結束這場學生運動。我相信他們也沒有料到也不希望看到政府採用了現在這種措施。

清華當時的校長張孝文聽說還是第一個高校的校長親自到各醫院認自己學校的學生。後來還參加了被打死了的同學的追悼會。

6月5日，一輛車載著一個被打死的只有七八歲男孩的屍體到幾所高校裏遊示。遇難孩子的母親也在車上守著她的孩子。在突然喪子的巨大痛苦衝擊下，她變得完全木呆了。既沒有哭泣，也沒有控訴。我卻覺得她的空白（這個世界對她來講再沒有任何意義）和木呆比有聲的哭訴更讓人感到淒涼和震撼。

清華在主樓大廳裏設了一個靈堂，來悼念所有在戒嚴屠城中死去的人們。蔡敖他們買了一匹白布從樓上的窗口一直垂到樓外的地面上。

有一個推車在街邊賣襯衣的。我先想人們的經濟活動還真不受政治乃至有生命危險的影響。再仔細一看他們賣的是白色和黑色的襯衣。我也趕緊買了一件黑襯衣穿上。我的一位朋友見到後說：“你怎麼還這麼敢呢！”這些都是我們對殺人政策的無聲抵抗。

其實在6.4之後的最初幾天裏，戒嚴部隊只控制了西到復興門，東到建國門以內的市中心。直升飛機不斷地在郊外與廣場之間往返。看起來陸路交通還不被戒嚴的指揮者所信賴。這也才有群眾在6.4和6.5燒軍車。請注意時間上的關係和被燒軍車的地理分佈。戒嚴部隊是在6.3夜和6.4凌晨大規模開槍的。而軍車是在戒嚴部隊已經佔據廣場開過槍殺過人之後被燒的。更甭提大部份軍車還是在那些開車到位然後棄車的軍人指導下燒的。被燒的軍車又主要是在從禮士路到軍事博物館一線。

在那幾天晚上，時不時會有零星的槍聲，還有群眾在樓裏向外大聲地喊口號。6.6日半夜，復興門立交橋附近突然槍聲大作，持續了幾十分鐘。後來聽說是幾個年輕人在鐵桶裏放鞭炮騷擾在立交橋上駐守的戒嚴部隊。戒嚴軍人狠命地回擊了一通，也沒有找到具體的目標。

6日白天時，我有意繞道從復興門立交橋旁走了一下。立交橋上八輛坦克向

著四個方向揚著炮口。士兵們在用澆花的橡膠水管接水洗臉。他們好象幾天裏都沒有後勤的支援。後來他們幾人一起端著槍到禮士路口的一家食品店搞吃的。嚇得群眾都躲得遠遠地觀望。

最讓人焦慮的是幾天來中央領導也不露面。從立交橋上坦克的佈陣來看，他們針對的也不像是學生和市民，而是與他們有同等作戰能力的其他軍隊。中央上層也不那麼統一，對於局勢也不敢說是完全掌握了。他們在擔心軍隊中會有拉出來造他們反的。如果軍隊之間幹起來的話，那將完全不同於鎮壓學生和市民了。

北京城裏有人開始驚慌。加上那幾天裏北京還時有停電停水的情況，北京已經讓人感到非常不安全了。我的姐夫已經在想把老人和孩子送到外地鄉下去避一避。只是他自己的父親和我的母親都不想離開北京。北京畢竟是他們這些老人居住了幾十年的家了。

高自聯在此情況下也發佈了空校宣言。外地的學生能回家的都回家了。這時候離京也確實像逃難一樣。北京站不敢走。有點錢距離遠的坐飛機跑了。其他人想辦法到永定門或豐臺去坐火車。我們的幾個朋友們就是先向北，出了張家口，然後才往各自的家鄉跑。

沒有回家的學生也不敢住在宿舍裏。許多老師都把沒有回家的學生接到自己家裏避一避。學生宿舍區裏，學校確實是空了。各個學校也不希望戒嚴部隊進駐。清華率先把教師組織起來護校，表示不需要戒嚴部隊的幫助就能維持學校的秩序。我也被排班在校門口值勤。清華平常是隨便出入的。現在則要出示證件。清華團委的一位幹部看我值勤覺得有些滑稽或是覺得我是不是有些投機，譏諷道：“你不是在廣場上聲嘶力竭的嗎，怎麼現在在這兒幹呢？”大概她真的認為我這樣的是惹事之徒，該由戒嚴部隊抓起來。這樣天下也就太平了，他們就可以專心從事他們的事業了。只是他們的“事業”是什麼？我實在不是很理解。

十三 秋後算帳



終於，6月9日鄧小平接見了戒嚴部隊幹部並在電視上播出。看來局勢已經在他的掌握之中。全國各地的領導陸續發電表示對中央的擁護。北京的戒嚴也才真正地在全市實施，並且實施得非常徹底。在北京的每一個路口，都有兩名以上的軍人荷槍實彈地站崗值勤。

在接近市中心的長安街兩側，6月4日後留下了上百輛自行車。都是那天晚上在長安街一線阻攔軍隊或在廣場堅持到最後的人留下的。現在被收檢堆放在一起，說是讓人來認領。可是沒有人去領。誰都知道去領自行車就是自投羅網地說你是那天阻礙戒嚴的暴徒。我很慶幸我算是及時地推走了我的自行車，不然的話我現在也肯定不敢去取了。

11日晚，蔡敖、袁夕和我一起到蔡敖的宿舍裏看電視上播放對21位學生的

通緝令。這次運動中湧現出來的學生領袖盡在其中：王丹、吾爾開希、柴玲、劉剛、王超華等。清華有三位學生榜上有名：周封鎖、張銘、和熊煒。很清楚，現在不僅是要秋後算賬，而且要抓一批人。把這一事件的所有責任都由他們來承擔。

這21個僅是前奏，後來又抓了許多，不再只是學生，社會各階層的都有。只是沒再在全國範圍公開播發通緝令而已。

看完通緝令之後，我們也擔心有被抓的可能。我們當即商量了要做那些準備：有關運動的所有材料都堅壁清野；要被追查時建立必要的攻守同盟。

很晚我才離開蔡敖的宿舍。他的宿舍就在已經空盪了的學生宿舍的頂層。當我下到一樓的時候，袁夕在樓上用已經是顫抖的聲音叫我：“老海！老海！”那聲音在深夜寂靜空曠的樓裏顯得是那樣的淒涼和恐懼。袁夕在喊之前也沒有意識到會有這樣的效果。不然他肯定寧願跑下樓追我也不願意這麼叫我了。原來我們還有些東西要處理。

我一直以為我自己是很放得開的人。遇事雖然容易激動，但並不愛驚慌害怕。就像面對戒嚴士兵的槍口時，我並沒有感到害怕而是感到非常的氣憤。對於可能因思想的“犯罪”而去坐監獄，我也是有思想準備而毫不畏懼的。不僅是《紅岩》裏的主人公們為我樹立了榜樣，就是我的祖父因幾進幾出監獄也稱監獄是靜修的好去處。他曾這樣寫他在獄中的心態：“幾忘卻身在這踞天脊地的獄裏，恍惚是居天下之廣居，行天下之大道在路上，做躍躍進取的工夫哩。”

可是這一夜我卻不斷地做惡夢。夢與現實交織在一起，一會兒顯得那麼真實，所有的背景都是我的現實，好像就在真的發生一樣。一會兒又很離奇。

夢一：我就在我的床上睡覺，樓下有了一些動靜，我聽見有人在走動和詢問的聲音。我先想如何能逃脫。等了等，還沒有人來敲門。他們好像在查看是否把從我住所能夠走掉的通道都已經把住了。我已經無路而且也不可能逃掉了。我開始想他們會如何對待我，我又應該如何表現才能顯出鎮靜、不失風度、不露驚慌。這一切顯得是那麼真實，我完全不能把夢與現實區分開來。

夢二：我在一場戰爭中。敵人好像是日本鬼子，但決不是戒嚴部隊的軍人。我不清楚我是在樓裏，還是巷裏，亦可能都在，總之是在城裏打這場仗。槍戰打得非常厲害，子彈不斷地呼嘯而過或打在我的周圍。我早就不知道被打中了何處，血流得到處黏糊糊的。在激烈的槍戰中我顧不上查看是哪傷了又有多嚴重，只是在用每一個可能的東西來掩護我自己。

其中我記得最清楚的是大學生宿舍裏用的那種上下鋪的鐵床。雖然這種床根本就擋不住子彈。我想它之所以在我的夢中出現，是因為它的鐵管架子與西長安街幾個十字路口的鐵管欄杆有相像的地方。而那些十字路口的欄杆中，在6.4時被彈穿了的非常多。直到我離開中國的時候，這些欄杆還沒有被換掉，那些彈孔也沒有被填補。是6.4時軍隊沿那條街射擊猛烈程度的真實記錄。

最後夢中的槍戰終於告一段落。勝敗不知，在夢中也不那麼重要。只知道和幾個朋友劫後相逢，我習慣地伸手到衣兜裏掏出煙來請哥們兒們抽。拿出一看，煙卷早已被鮮血浸透，用打火機點了好幾次都點不著。對於這一細節我醒後乃至如今都久久不能忘懷。記得剛到美國不久，就看了一場電影《致命武器—2》（Lethal Weapon 2）。電影的結尾是劇中的男主角（Mel Gibson飾演的）在歷盡艱辛的生死搏鬥之後，終於擊斃了敵手。他自己也遍體鱗傷、奄奄一息、行動已經非常困難了。既使如此，他還想起來要做的事，就是相當艱難地掏出煙來抽。看到這我就不能不想：我那夢中的一幕比起Mel Gibson的場面來不知要感人多少倍。

其實我是過於緊張。雖然我後來確實是清華教師中清查的重點。但我一直是在校內被審查的，從來還沒有被公安系統收留去或落在戒嚴部隊的手裏。所以一直還有人身的自由，可以從容地和伙伴們制訂攻守同盟。倒是我們的一個朋友張亞非，6.4之後還出了一本地下刊物，在我出國之後被抓起來判了11年。不知道現在是不是出來了。

局勢控制住後，學生們被要求返校進行思想教育。畢業班的同學只有在通過了對這次運動的思想認識，並寫出文字的思想匯報之後，才可以參加畢業分配。為了做好學生的思想轉變工作，學校要求每三到五個同學就要配一名教師幫助他們。幾乎所有的教師都被派到各個班級的學生中去作工作。只有我因為不再被信任，也就不能再派到學生中去做他們的思想工作。我當時就自嘲地說“我是入了另冊的”。

這一時期，無心做事，開始學打麻將。好幾次都打了通宵。很多同學也是如此，讀書學習的事都做著沒意思。以前覺得自己將來是國家的棟樑，學習上很有自主的積極性。現在想著自己成了動亂分子，也就不再想什麼事業和前途，而有一種醉生夢死的感覺，在玩鬧中發泄鬱悶的情緒。畢業班的學生聚餐。大家在一起吃飯，在一起喝酒；然後在一起大哭，在一起大唱《國際歌》；最後在一起把酒瓶子砸得粉碎。後來北京市下文件不許大家隨便唱《國際歌》。學校裏也禁止砸酒瓶。

學生中仍然有地下的嚴肅的政治討論會。我曾參加過兩次。在當時那樣的白色恐怖下，這種地下活動當然相當慎密，每一次是在一個不同人的家裏。大家不能同時到達，那樣會引起別人的注意。大家零散地顯得很自然地分別到達。關上門以後的討論仍然是激烈認真的。只不過我並不喜歡討論會中佔主流的思想：要保證經濟改革的繼續深入發展；這種發展會造就出相當數量的中產階級（有相當自己獨立財產的人）。等到這個中產階級壯大到一定程度時，一方面他們對中國的經濟會有舉足輕重的影響；另一方面他們會有自己獨立的經濟利益，從而就有獨立的政治要求。這些人就將成為真正的政治反對派。

中國後來的發展路子，基本上符合他們當時的許多想法。經濟的改革不僅沒有倒退，在92年之後還有了更新的發展。但是新生的有產（有錢）階級，好像不是和有權階級融為一體，就是和有權階級達成有政治上的交易。他們是中國經濟較高速發

展的即得利益者。所以並沒有見到他們提出任何對中國更有前途的主張。

由教委發文要求各高校認真清查在運動中表現出問題的人。各校都成立了至少是由黨委副書記掛帥的清查辦公室。清華清查辦的專職工作人員是由學校保衛部、人事部、校團委、校工會及各系抽調的教師組成的。我們在運動中有表現的人被要求寫出詳細的交代材料來。在其中要列出在哪一天，在什麼地方，你幹了什麼，又有誰能為你證明。這後一條是連環套，你在為你自己提供證人的時候就有可能揭發了他人。對這些小伎倆明眼人一看就穿，所以我們早就串好了供：那些事要談，那些事不談；誰給誰作證。

我寫的第一稿材料中有著許多對比：學生沒有組織系統，沒有輿論手段，沒有聯絡工具，有的只是人民群眾的廣泛支持。政府有嚴密的組織體系、強大的輿論工具、先進的聯絡手段、和武裝到牙齒的軍隊。那隱含的意思當然是這結果只論輸贏，而無正義可言。

材料寫好後，先給同教研組的老同志看。他們非常善意地要我改，說我是在氣頭上寫的，這麼寫於事無補，你通不過審查鑒定。在他們的幫助下我又寫了一個帶有自我檢討的東西交了上去。

對這份東西，清查辦領導也不滿意。倒不是思想上的認識，而是說我“沒有如實地交代”。可是他們自己也找不到證據材料。他們只是感覺我做的要比我交代的得多。在和清查人員面對面的談話中（因為沒有正常的法律程序，所以不稱之為審訊。問我話的有兩個人，一個人主問，一個人記錄。）我心胸坦盪、問答自若。據說給問話的人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在問話過程中，不時有其它房間（在問別的人）的工作人員拿著條子給問我話的人。條子當然不給我看。我猜想是一些人的名字。他們要看看在我交代過程中會不會提到這些名字。

清查對我的影響是我不能出國。我是在運動前就聯繫出國的。本來在89年8月就該入學報到的。6.4之後必須有關於運動表現的政審材料才能辦理出國手續。直到89年底，我想也跟大氣候有關，我才被允許辦出國手續。同伴中高戈的黨員轉正被拖延了。其他人都沒受太大的影響。

有一個人，因為他已經去世了，在此提到他也不再會給他帶來任何麻煩了。所以我想講講他並趁此機會悼念他。

在運動的高潮時期（戒嚴令之後開槍之前），我曾經非常衝動地給當時的廣播電視部部長艾知生打過電話讓他要站在人民一邊。他當然沒有答應我什麼。但我們都知道在開槍之後的幾天裏，中央電視臺的新聞播音員杜憲、薛非、張宏民在全國觀眾面前一人一身黑素裝，表情和語調都很沉痛地播發的新聞。對外的英語廣播則明白無誤地要世人記住6.4這歷史上最黑暗的一天。後來我也聽說李鵬找艾知生訓話，責備廣播電視沒有和中央的步調一致。從此艾知生的仕途沒有再進一步。年紀不能說是很老就從部長的位置上退了下來。後來他得癌症去世不知是不是與心情也並不愉快有關。記得在清華時我們都愛游泳。我是遊各種花樣，他是嚴格地鍛煉身體。我一

直認為他的身體是很健康的。

我這次給他打電話對他是否有影響（包括後來在政壇上的發展），我不知道。但我很清楚他從來沒有向別人（諸如清華有關方面）透露過此事而使我受到任何影響（在審查我的過程中從來沒有人提過此事）。對此我是非常感激的。

我和艾知生相交已久。他曾在我母親那兒給予我很正面的評價。在他任國務院副祕書長期間，鐵道部曾發文取消研究生探親回家的半票待遇。在我們活動下，經他干預，鐵道部改變了那項決定。

就在他要走馬出任廣播電視部長的時候，我們又碰上了一次。我還搭他的車一道回清華。在談到廣播電視部的情況時，我告訴他說廣播電視部是一個是非之地，到那兒當頭可是不好幹。他在官場裏當然是身不由己。只可惜廣播電視部竟真成了他仕途的終點。

我不能說我對他的思想觀點都很贊同。但是我認為他作人還是很誠實的。在我們的交往中，不管他任哪一級的幹部，從來與我是平等相待，決無居高臨下的態勢。對他的英年早逝（與很多老幹部 90 多歲才死相比），我很感痛惜。借此我對他表示真摯的敬意和深深的悼念。

在此我也對所有在清查中幫我過關的朋友們，包括在清查辦裏工作的表示衷心的感謝。

十四 六四引發蘇東波



西方報上曾有過一幅漫畫來比喻 89 年中國民主運動對世界的意義。在基督教的傳說中，當耶穌誕生的時候，東方升起了一顆星。三個智者就是在這顆星的指引下找到耶穌誕生地的。

在這幅漫畫裏，誕生的是東歐社會主義陣營瓦解和蘇聯解體後的世界新的政治格局。而指引這新世界誕生的那顆星就是中國的 6.4。這個評價一點也不誇張。

下面是東歐和蘇聯民主進程的時間表。

就在中國民主運動的後期（政府宣佈戒嚴之後），匈牙利黨和政府的領導就指出：匈牙利的軍隊絕不能介入政治改革與政治分歧的衝突之中。

89 年 11 月東德打開柏林牆。同月捷克議會結束了共產黨的一黨統治。

89 年底，羅馬尼亞發生了反對羅馬尼亞長期統治者齊奧塞斯庫的風潮。齊奧塞斯庫接受中國方面的意見和榜樣，採取了強壓的政策。他有一支裝備精良、多年培

養要效忠於他的御林軍。這支御林軍鎮壓時比較兇猛。結果他在一次大會上講話後，全場從他所期待的掌聲變成了打倒他的口號聲。後來齊奧塞斯庫慘死。羅馬尼亞從此走入民主國家的體制。

90年蘇聯共產黨結束一黨專制。東西德合併。聯合工會主席瓦文薩成為第一任波蘭民選總統。

91年8月蘇聯發生政變，8位國家領導人趁戈爾巴喬夫度假時機將他軟禁並宣佈解除他的職位。蘇聯民眾起來反抗。蘇聯國防部長受命鎮壓，他在人性和黨性（他所忠於的政變派）的矛盾衝突中，放棄了鎮壓，選擇了自殺（他不忍心下令讓他的坦克向他的人民開槍）。我相信在他的選擇中，一定是有中國6.4例子為借鑒的。結果反政變在葉利欽的領導下取得了勝利。

92年初東西方共同宣佈冷戰的正式結束。

世界政治的新變化反過來又給中國的政治很大的衝擊。這也才有了92年下半年鄧小平的南巡和商品經濟在中國的認定。

中國的民主運動在血腥的鎮壓下失敗了，這顆星隕落了。但是它追求民主自由的精神和被鎮壓時所流的鮮血在專制漆黑的夜幕裏發出了星光，引發、激勵了東歐和蘇聯的民主化進程，促進了世界新政治格局的誕生。

臺灣人民反對國民黨暴戾政策的二二八民眾起義，時過45年才立起了一座紀念碑。紀念六四人的碑什麼時候會立起來，我不知道。六四自身作為中國民主運動史上輝煌一頁的驕傲和中國血腥鎮壓群眾運動的恥辱就是一個既高大又沉重的碑，永遠永遠地立在我們心中！

【全文完】

相關資料

- [紐約六四紀念會：六四錄像《回響》，1997年6月4日。](#)
- [日本電視臺：六四鎮壓時紀念碑學生錄像，1990年6月4日2時。](#)
- [南半球常客：一篇常見的網上造謠文章——駁《六四真相--紀念被出賣了的學生與市民》--歷史](#)

只能調查，不可臆造（增補本），2000年4月17日。

- 六月血：天安門民主運動大事記，2000年5月15日。

- 日本電視臺：六四凌晨柴玲和紀念碑同學錄像——柴玲、紀念碑上的同學，1990年6月4日2時。

- 海明：清華教師六四回憶錄，1999年5月18日。

- 六四檔案：最後的紀念碑，1989年6月4日。

- 全球“六四”十五周年紀念籌委會：八九“六四”……永遠無法抹去的記憶——“六四”十五周年全球徵文啟事，2004年3月5日。

- 六四檔案：紀念碑台階，1989年6月7日。

- 趙紫陽：胡耀邦追悼大會上的悼詞，1989年4月22日。

- 北京青年報：趙紫陽會見戈談話——絕食日志：絕食第四天（89.5.16星期二），1989年5月16日16時。

- 網路圖片：參加八九鎮壓的軍官李曉明先生在墨爾本“六、四”紀念會上，2003年6月4日。

- 方勵之：致鄧小平的公開信，1989年1月6日。

- 網路圖片：紀念碑詩抄，1989年4月16日。

- 楊浪：耀邦同志走了，1989年4月18日。